

德国快讯

2016 年第 16、17 期 · 总第 664、665 期

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 · 德国问题研究所 · 《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政治动态

- 联盟党与社民党困境中欲回归核心能力
- 联邦宪法保护局将监督“认同运动”
- 北威州成立 70 周年庆典

经济纵横

- 德国肉产品出口增长，大量肉类销往中国
- 德国一次性饮料包装占据消费市场
- 德国政府预测：工作岗位与失业人数同步上升
- 房租刹车法令收效甚微

社会文化

- 德国移民潮没有导致犯罪率上升
- 德国难民教育水平悬殊
- 援助难民动力依然十足

热点透析

- 罩袍禁令之争：意识形态的面纱
- 德国民众对待难民：恐惧与援助并存

政治动态

联盟党与社民党困境中欲回归核心能力

《南德意志报》网络版 8 月 23 日评论 先是联邦国防军在国内进行部署，接着是在所谓的威胁者身上安装电子监控设备，再后是进行脸部识别。联盟党，特别是基民盟目前正在扩展安全政策的要求，其行动速度快得让人跟不上。这些可能会让人感觉没有方向，但背后却有很清醒的考量。

党派已经开始注意自己的核心能力。近期，在社民党那里也可以注意到类似迹象。去年，西格玛尔·加布里尔（Sigmar Gabriel）还竭力将党派朝中间推动，现在他开始更加注重社会公正，即社会民主的关切。基民盟这么做是因为德国选择党从右侧挤压得它喘不过气来。社民党则是因为他们在民调中表现一直很差，加上党主席加布里尔害怕自己被挤走。而两党打算回归本源的推动力都是因为面临困境。

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反而在政治中会经常遇到。之前在 2013 年大选时，当时的自民党第一候选人赖纳·布吕德勒（Rainer Brüderle）努力用他所谓的“面包与黄油”主题挽救自民党的没落。在英国，是工人党的持续危机才将激进左翼候选人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引向领导角色。布吕德勒的失败已众所周知，科尔宾大概离失败也已经不远了。联盟党和社民党现在也让自己面临这个问题：专注于核心能力究竟能够带来什么，特别是在多年来党派想获得的固定选民人数一直在缩水的时候。

对于基民盟，还要再观察一番才能回答这个问题。而社民党其实已经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至少从表面上可以。在 2013 年的选战中，社民党提高税收的要求一个接着一个，之后在大联合政府执政的第一年中，社民党推出了很多社会民主关切的措施，这让人感觉他们似乎在独自执政。不过他们的民调成绩并没有改善。

他们还有其他结构上的原因。从根本上说，特别是在选民吸引力日益降低的时期，释放可靠的信号才有意义，因为这些信号可以在仓促中保证立场与方向赢得支持，但前提是彼此要有足够的信任。而社民党在直至 2009 年的执政时期一直让他们忠实的选民感到不知所措，以至于在危难时候无法再次赢回他们。例如，保守的社会民主党派人士佩尔·施泰因布吕克（Peer Steinbrück）的言论与其作为总理候选人时所必须代表的社民党纲领是如此的格格不入。

对基民盟来说，回归核心能力具有双重意义。首先它们不能让德国选择党成为唯一在当前选战中立刻就能谈到安全问题的政党。基民盟必须再继续坚持一下，并且保持严肃性。歇斯底里的、不靠谱的要求要一直让德国选择党提出。其次，在联盟党内，领导人的言论与纲领要互相匹配。问题是，默克尔是否就是能在竞选时引入国内安全议题的正确人选。

这是一个方向性决定。默克尔开放基民盟，去掉其教条，但同时也去掉了基民盟的内核，使其变异。如果默克尔作为党的领导人认为 2017 年专注“面包与黄油”主题是有效的方法，那么，可能其他人才是合适的领导人选。内政部长托马斯·德迈齐埃（Thomas de Maizière）正在展示应该如何做。

联邦宪法保护局将监督“认同运动”

德国电视一台网 8 月 12 日讯 联邦宪法保护局宣布将把右翼极端的“德国认同运动”（Identitäre Bewegung Deutschland）置于监督之下。之前是联邦州在执行这项任务。该运动团伙主要是反对穆斯林移民。巴登-符腾堡州的州宪法保护局在 2015 年度报告中

记录了德国认同运动的“极端右翼的和种族主义的观点”。

该团伙从 2012 年开始在德国活跃起来，其运动起源于法国。起初，相关人员通过网络散布他们的观点，他们尤其反对穆斯林的移入。他们认为，穆斯林移入欧洲是穆斯林阴谋的一部分，包括对经济、政治与媒体等各方面的渗透。穆斯林想通过这种手段破坏欧洲的传统与文化，用非欧洲移民替代欧洲大陆的各民族人民。

后来，该运动渐渐将他们的活动从网络转移至街道上，并号召大家游行示威、发放传单。该运动的组织者们定期碰头。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成立了“认同运动”的分支。

北威州成立 70 周年庆典

德国西部广播电台一台 8 月 23 日讯 23 日德国民众庆祝北威州成立 70 周年。英国威廉王子和德国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出席了在北威州首府杜塞尔多夫举行的成立庆祝活动。

每次聚会总会有一位重要来宾。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成立庆祝活动上，这次的重要来宾是英国剑桥公爵威廉王子。这位 34 岁的王室成员周四（8 月 23 日）所到之处，人们无不欢欣鼓舞。23 日下午，威廉王子作为贵宾出席备受关注，而同样受到人们关注的是，驻扎在德国瑟内拉格的英国第 20 装甲旅被授予北威州的色带旗。此次威廉王子的夫人凯特王妃没有同行，但这位英国王子的到来足以为北威州的成立纪念日赋予了王室的光辉。

威廉王子在致辞中表达了对北威州的赞美。他说，英国人 1946 年将差别悬殊的威斯特法伦地区和莱茵地区合并为北威州，这个州书写了成功的历史。70 年后人们可以这么说，当年的联姻行动取得了成功。北威州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联邦州”，对于英国来说不仅是紧密的合作伙伴，更多的是一位朋友。尽管英国已脱欧，但这一点不会改变。威廉王子说：“我们深厚的友谊不会改变。”来自社会各界的 1300 名来宾对此报以热烈的掌声。

其他的庆典发言也都是溢美之词：生日庆典就是这样，谁也不愿听到诸如他已经有皱纹了，或者它的经济不行这样的话。联邦总理安格拉·默克尔强调了北威州对于联邦德国命运的特殊意义。“北威州是德国强大的一部分”，默克尔还眨眨眼说，“它的德甲球队之多其他州无法企及的”。默克尔也强调了北威州在难民危机中在难民融合方面做出的成绩。“北威州是宜居的，也是值得人热爱的。”

难民问题也是北威州州长汉内洛蕾·克拉夫特（Hannelore Kraft，社民党）演讲的主题。她说，北威州从一开始就学会了在重大的任务面前不是放弃而是解决，这存在于这个州的基因中。对于所有愿意解决问题的人们，北威州将来仍然会是他们的家。克拉夫特用英语对以威廉王子为代表的英国人表达了感谢，感谢他们给予北威州的信任和通过成立北威州而给予它的机会。北威州州议会议长卡利那·古德库克（Carina Gödecke，社民党）同样对王子表达了感谢，并呼吁民众要保持开放的胸怀。

经济纵横

德国肉产品出口增长，大量肉类销往中国

德国电视一台网 8 月 16 日讯 德国的肉类生产量创历史新高，但本国的肉类消费却有所下降，这导致大量的德国肉类产品销往中国等其他国家。在中国，德国产的五花

肉和猪蹄十分受欢迎。

德国绿党在三年前曾提议，应在德国员工食堂推行强制的“素食日”。此举引发德国民众的愤怒，最终“素食日”建议不了了之。可见，当德国人必须担心盘中肉排不保时，会引起一些不快。但德国人现在似乎对肉食越来越不感兴趣了：在一些超市里，肉类替代品的货架数量渐渐与肉制香肠的持平；一些城市涌现出大量的素食餐馆，而且很多时候都是满座状态。食肉者或是为他人烹制肉食的人，非常注意如何处理整只动物：明星厨师在电视节目中讲解怎样自己动手还能把猪的牙龈肉烹饪成美味；汉堡市或柏林的厨师向年轻的顾客提供来自当地屠宰场的动物内脏，作为比奥纳德饮料（Bionade）和精酿啤酒的下酒菜。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最新数据，德国企业于 2016 年上半年生产了 410 万吨肉，创下了半年德国肉类生产量的新纪录；2015 年德国总共生产了 822 万吨肉，这同样也是一个新纪录。

同时，“德国民众的肉类消费连续下降，但只是轻微下降”。德国联邦农业与食品局的数据显示，2015 年德国人均肉类消费量为 59.17 公斤，2014 年这一数字为 59.99 公斤，2000 年是 60.98 公斤，并没有太大的浮动。据联邦食品与农业部的报告，只有三成的德国人放弃食用肉类和香肠，有五分之四的德国人一周仍会多次食用肉类。

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德国 2016 年 1 月到 5 月的肉类出口量同比上涨 4.1%，从 154 万吨增长为 160 万吨。其中很大一部分肉产品出口到了中国，其占比上涨了 84%。德国环境与自然保护联合会的卡特琳·温茨（Katrin Wenz）表示：“德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肉类出口国之一，联邦政府在过去的几年中有力地推动了德国作为肉类生产地的发展。”

出口到亚洲国家以及东欧和俄罗斯的，常常只是动物的各个身体部位。德国农民协会的迈克尔·洛斯（Michael Lohse）对《每日新闻》表示，与祖辈不同，现代德国餐桌上不再需求内脏、猪蹄、猪耳朵和五花肉等，它们会出口到其他国家。相反，由于生产量满足不了本国需求，德国会进口德国人偏爱的肉排、里脊肉、胸脯肉或胫骨。

德国国内只有大型屠宰厂支撑着肉类出口，较小规模的混合经济的屠宰厂要么必须为生存而挣扎，要么早已破产。据《肉图册》（Fleischatlas）的数据，过去 20 年中德国的猪肉产量上涨了近一半，而屠宰厂数量却大幅缩水——减少到 27000 家，下降了 90%。

目前，德国仍有 75% 的出口肉类进入到欧盟内部市场，但亚洲国家和其他新兴国家才是肉类出口国的希望：中间阶层的发展意味着肉类消费的增长，因为肉是地位的象征。

而批评者们希望，这种大规模生产能出现转机，回归地区化生产，以更利于动物生存和环境发展。德国动物保护联合会主席托马斯·施罗德（Thomas Schröder）向《每日新闻》表示：“我们最终需要的是一个全国性的动物保护战略，重质量而非重数量。”虽然，德国肉类消费没有明显下降，但据联邦农业部统计，如果能有利于保护动物的话，80% 的德国民众表示愿意在肉产品上花更多的钱。

德国一次性饮料包装占据消费市场

德国电视一台网 8 月 16 日讯 德国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原本是为了提高可重复使用的饮料包装比重。而实际情况是：德国一次性饮料包装的份额不断增加，目前已达到 55%。

德国绿党议会议员贝贝尔·霍恩（Bärbel Höhn）提出相关询问，联邦政府引用包装

市场研究协会的统计数字对这一问题进行解答：自 2004 年以来，德国一次性饮料包装产生的垃圾数量上升了约 30%，包装消耗量从 2004 年的 46.5 万吨增长到 2014 年的 60.03 万吨。据德国联邦环境部的数据，2014 年德国一次性饮料包装的份额约为 55%。近几年来，联邦政府没能如期实现将可重复使用的饮料包装份额提高至 80% 的目标，联邦环境部在新包装法草案中放弃了这一目标。联邦政府在解答中称，可重复使用的饮料包装份额的强制规定“在法律上难以实行”。今后商店的标签上应标出是否使用了一次性饮料瓶，此外生产商也有义务对一次性包装进行更明确的标识。霍恩在评价政府解答时表示，在贯彻联合国提出的可持续性消费方面，德国的政治要求与实际需要还有很大差距；一次性饮料包装的份额增长如此之快，令人“震惊”。

德国政府预测：工作岗位与失业人数同步上升

德国电视一台网 8 月 16 日讯 德国联邦政府预测，德国因移民潮到 2020 年失业人数会有所上升，但同时就业人数预计增长 100 万人。

德国《图片报》报道称，联邦财政部预测德国将出现更多的失业者，失业人数将于明年平均增长 11 万人，上升到 286 万人，这将是 2013 年以来失业人数的首次增长。今后几年劳动力市场将继续这一发展趋势。根据预测，难民危机期间德国劳动力供给的增速超过就业机会。到 2020 年德国失业人数将平均上升到 310 万人。与此相对，德国的就业岗位数量还会继续增长。联邦政府称，到 2020 年德国工作岗位将每年平均增加 100 万个，上升到 4410 万个。

桥梁问题迫在眉睫

德国电视一台网 8 月 12 日讯 位于科隆-勒沃库森高速公路 A1 上的勒沃库森大桥日前暴露出许多问题。因为要修补一条长约 40 厘米的裂缝，该桥到现在已被封锁三天了。虽然该大桥在 20 世纪 60 年代修建设计时设定每天有 40000 辆车通过，但实际通常每天有 120000 辆汽车与大卡车经过此桥。

威斯巴登与美因茨之间的舍尔斯坦大桥多年来也一直让有关部门感到头痛，不得不多次被整修。尽管在桥上行驶速度要求不超过 60 公里/小时，但车道在 2015 年 2 月因下沉 30 厘米而被封锁。

德国 5% 的桥已破损不堪，需尽快修整。该数据来源于联邦交通部与各州交通部的桥梁数据，去年 9 月份《世界报》还曾对该数据进行过评定。数据采集自各联邦州修路部门。

桥梁工程师汉斯-戴尔特·洛夫（Hans-Dieter Lohoff）认为德国大桥的问题首先在于一直增长的交通数量。洛夫以勒沃库森大桥为例解释说：“随着交通数量的增加，该桥现在每天都要经受的通行车辆是设计时所预期的总运输车辆的三倍，加之载重车辆增加且轴负载增加”。有许多因素造成了材料问题。

尽管建筑的这些缺陷会形成一定风险，但桥梁不太可能出席坍塌。工程师每年都会进行一次外观检查，每六年进行一次彻查，桥梁每个部分都会被仔细检查。如果有必要，检查者还会为桥梁进行重量限制或者限速设置。在一些情况下即使会引起交通堵塞，还是会封桥。

贝尔吉施格拉德巴赫应用技术大学汽车经济学教授斯蒂芬·布拉泽（Stefan Bratzel）认为，如果主管的联邦交通部没有长久视而不见的话，则无须经常采取以上措施。这些问题非一夜之间产生。每条街道、每幢房屋与每座桥梁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因此桥梁

的更新对主管部门来说必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现在问题出现了，必须进行大量修缮工作，对此没有快速解决的办法。

建筑工程师与德国汽车俱乐部的交通负责人于尔根·贝利茨（Jürgen Berlitz）对主管部门的行为批评道：“人们在近五六年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紧迫性。而其实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德国就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在维护道路与桥梁方面加大投入。”就算问题的应对措施采取太晚，但至少在当前交通道路规划时就认识到问题并适当予以关注。

联邦交通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德（Alexander Dobrindt）为桥梁现代化提出一项特别方案，该方案至 2018 年需 20 亿欧元。专家布拉泽断定，在不久的将来针对问题桥梁仍无计可施：“人们只能慢慢应对现有的桥梁问题。这会对汽车司机、尤其是卡车司机产生一定的影响。大部分司机早就已经无法直接到达目的地，因而要消耗更多的时间与汽油，进而造成环境污染。”

房租刹车法令收效甚微

《南德意志报》网络版 8 月 16 日评论 自去年起，300 座德国城市开始执行房租刹车法令。若房屋为首次出租，房主最多只能收取高于当地平均租金水平 10% 的租金。该法令具有法律效力。如果观察德国上半年房租的发展趋势，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今年夏季，汉堡、慕尼黑与科隆等城市的房租较去年增长了 6%。正如德国经济研究所计算的一样，自 2010 年柏林与斯图加特的房租增幅高于平均工资的增幅。很多其他地区刚好相反，但这并不能让人觉得欣慰，而仅仅证明了城乡差距正在增加。毕竟目前租房者的平均收入要低于国民的平均收入。

数据表明，由联邦司法部部长海科·马斯（Heiko Maas，社民党）提出实施的房租刹车法令并没有达到目标，虽然假如没有限制，租金可能会涨得更厉害。然而马斯却没能实现他的承诺，即让大众支付得起城市聚集区域中心的房屋租金。

未曾预料到的房屋高需求造成了房租上涨。一方面，更多的年轻人上大学并随后留在城市；另一方面，2015 年逃到德国的难民人数空前绝后，而供给没能及时跟进。虽然政府批准了新建更多的住房，但等到它们建造完成还需要几年。此期间无疑对房东有益，而对租房者来说费用将变得更加昂贵：租金上涨，房价升值。这将加剧财富分配不均。

因此政府引入房租刹车法令是对的。缓解社会不公是国家的职责。但政府在决定采取某项措施时，选民往往会期望这项措施能成为一个有效工具。而黑红大联盟在这点上却失败了：司法部长仅仅起草了一份无效用法律。更何况，联盟党还坚持在该法令上设置了很多例外条款。此项法令最大的错误在于：房东若不遵守法律并不会受到惩罚。最糟糕的情况也只不过是多收取的租金予以归还，而无需缴纳任何罚款。房东违反法律却没有任何损失。

这一点马斯从一开始就不想改变。他认为，这项法律还刚刚开始实施，租房者必须先了解他们的权利。其实，即使租房者了解自己的权利，如果他们想主张这些权利，还得自己想办法和房东打官司。但是，如果好不容易找到一处房子，谁还会再主动去打官司呢？根据租房者协会的经验，几乎没有人会这样做。在 2017 年大选前马斯根本没有时间来挽救房租刹车法令。他已声明有两处改动，咨询会自数月前也已开始，但无法指望进行计划中的房租水平线改革。社民党最初要求在未来当地常见房租应按照过去十年租房合同的价格为标准来计算。当前的租金水平线仅涉及过去 4 年的情况，而这 4 年也是租金价格增长最快的 4 年。现在最新的修改草案将该时间区间调整到 8 年。最大的

可能是，联合政府最终达成一致调整为 6 年。但用过去 6 年的房租标准计算所产生的影响几乎为零。

另外，房子翻新后租金上涨的现状并未改变。若房东加建一个阳台或者新添暖气设备，他可以将花费中的 11% 转加至每年的租金当中。该项规定产生于房东必须为房屋翻新融资支付高达 8% 的利息的年代，而现在这个利息仅为大约 1%。社民党要改变这一现状的想法同样遭到反对。联盟党反对的理由是，需要激励房屋所有者投资建造与时俱进与节能高效的房屋。

在关键时期，联邦政府的整个房屋政策绩效平平。尽管所有人都认同要新建住房，但至今在城市中人们可以支付得起租金的房屋数量仍旧没有增加。如果联邦司法部长马斯无法改善房租刹车法令，那么在到来的大选之时就必须忍受这样的质问：当初究竟为何要实施这样一条法令呢？

社会文化

德国移民潮没有导致犯罪率上升

德国电视一台网 8 月 16 日讯 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称，德国数量众多的移民导致犯罪率急速上升。这一言论再次掀起轩然大波。然而他的这一论断与德国联邦调查局的统计数据正好相反。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 6 月份发布的数据，德国境内由移民造成的犯罪率并没有上升。该数据显示，2016 年第一季度由移民造成的犯罪行为甚至有所下降，1 月至 3 月期间登记的案件数量下降了约 18%。在第一季度的约 69000 个案件中，有超过一半的案件涉及到偷盗、财产犯罪和伪造犯罪。之前没有独立的移民犯罪统计资料，故而无法与过去的时间段进行对比。

叙利亚、阿富汗和伊拉克的难民在整体移民群体中占比很高，据德国警方统计，这部分难民中的犯罪者数量相对较低。相反，虽然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格鲁吉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突尼斯人在整个移民群体中所占比例不高，但很多犯罪嫌疑人都是来自这些国家的移民。

德国 2015 年全年警方犯罪统计也显示，数量众多的移民没有使犯罪率上升。该统计显示，如果不考虑外国人的特殊违法行为（如违反外国人法或避难法），德国在过去一年中犯罪案件数目并没有增加。根据警方统计，袭击难民及其住所的案件却时有发生。仅在 2016 年第一季度，就有 350 起袭击避难住所的案件发生。大部分针对难民的犯罪行为是暴力行为或侵犯个人自由的违法行为，其中 83% 为身体伤害。

德国难民教育水平悬殊

德国电视一台网 8 月 22 日讯 长期以来德国的民众都不清楚，来到他们身边的难民是何种文化程度。德国联邦劳动局的研究人员首次公布了明确的数据。

9 岁的爱玛来自伊拉克，还有两天她就要开学了，上二年级。1 月份以来爱玛在科隆的埃梅尔斯多尔小学上学，参加正规课程的学习。她从书包里自豪地翻出她的阅读册，德语是她最喜欢的课程。她十四岁的姐姐塞巴的成绩单上也有三门课程获得“优秀”。塞巴就读于一所文理中学国际班。毫无疑问，她们轻松地掌握了德语。在过去一年，因为阿拉米基督教徒，这两个小姑娘和她们的家人必须离开摩苏尔，逃离伊斯兰国（IS）

的魔爪。

移民受教育水平相差悬殊

爱玛和塞巴并非特例。很多难民都动力十足：想尽可能快地上学、上语言课或融入课。德国劳动市场与职业研究所（IAB）的研究人员赫伯特·布吕克（Herbert Brücker）表示，一个人长久地脱离职业体系或教育系统会丧失自信。“在一些方面，我们损失了半年乃至一年的时间，例如针对难民的语言课程。在我们确定下法律基础之后，在去年底才给新到难民提供语言课程，因此失去了宝贵的时间，同时难民的教育潜力是十分不同的。”

德国劳动市场与职业研究所（IAB）的首批分析体现出这一点。分析称，在有希望留在德国的避难申请者当中，46%的人上过文理中学甚至大学，其中就包括医生，这个职业在德国稍加适应性培训就可以找到工作；有27%的难民来之前上过中学或中专；至少有25%的难民只上过小学甚至没有接受过教育。

对那些2015年登记的有希望留在德国的避难申请者，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BAMF）曾做过问卷调查，德国劳动市场与职业研究所（IAB）的分析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展的。有77%的避难申请者参与了该问卷调查。因为接受调查者是自愿参加的，可以想象那些没有参加问卷调查的人受教育水平都不高，这也限制了该问卷的代表性。

但是这种基于高参与度得出的数据还是显示出一个明显趋势：难民的受教育程度两极分化严重。这主要与难民的来源国有很大关系：在阿富汗等长期爆发内战的国家，教育系统也遭受破坏；在叙利亚或伊拉克等国家，很多地区的教育系统直至去年还没遭受战争影响。

职业培训的补课需求

职业培训方面的情况要差一些：据德国劳动市场与职业研究所的2016年7月的数据，约70%的非欧洲难民没有接受过完整的职业培训。与此相比，德国同期求职者中没有完成职业培训的比率为38%。分析称，难民中该比率之高主要归因于这些难民的家乡没有像德国一样实行职教双轨制。

因此，重新进行培训就显得十分必要。但布吕克也表示，难民会带来一种全新的“文凭认可文化”。塞巴和爱玛的父亲也在接受这种再培训。他之前是一位卡车司机，但因为急于逃离而将驾驶证落在了家乡，现在他将使用阿拉伯语重新补上驾驶证。

观察家认为，德国的融入进程虽然有些拖沓，但正向前发展。布吕克称，未来一年里在有希望留在德国的难民群体中，预计有10%的人将找到工作；未来的五年里这个数字将上升至50%。

援助难民动力依然十足

德国电视一台网8月23日讯 整整一年前德国联邦总理默克尔用一句“我们做得到”来应对难民危机，如今德国很多难民援助者继续对此深信不疑。过去一年中，他们的任务已经有所改变，但动力保持不变。

尤莉亚·吕克（Julia Lücke）回忆起帮助来自叙利亚的家庭的时刻：她要帮助一个叙利亚家庭从网上的照片中辨认被砍头的父亲。她忘不了年轻的母亲向她详细描述，她孩子怎样淹死在地中海。尽管如此，吕克从未想过放弃。

吕克说：“我自己也是难民的孩子，我的家庭是成功融入的最好例子。”她的父亲很多年前为逃脱希腊共产党来到了德国。自德国爆发难民危机以来，她就一直在科隆韦瑟灵的难民营工作，这些难民主要来自马耳他岛。那里有500名难民曾生活在集装箱里，

期间他们被分配到各个城镇中去。现在集装箱被改建成永久居住点。

新的任务

“我们的任务变动很大。现在我们不再帮忙分饭和整理衣橱，最主要的是帮忙促进融合。起初是帮忙办理官方手续，然后是教授德语课，还会帮助寻找房子。”吕克负责配合援助志愿者的协调工作。她给桌子铺上鲜艳的桌布，给援助者们端上可口的希腊美食。一名地方协会的足球教练吃好饭，增强体力后要与三个尼日利亚孩子踢球。一名阿富汗青年向他的德语老师讲述，自己如何因为情变被人跟踪。吕克说，尽管对援助志愿者的要求不断提高，但他们的动力始终很足。

吕克在科隆韦瑟灵的境况也适用于德国的其他地区。据柏林洪堡大学移民及融入问题研究所的最新研究，大部分的义务救助者都一致认为：德国承受住了 2015 年秋季移民大量涌入的压力。

从小处改变社会

很多援助志愿者有同样的社会政治诉求：绝大多数的受访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最起码从小处改变这个社会，表达这一想法的人数占到 97%；有 90% 的人希望以自己的行动反对种族主义。贝塔斯曼基金会的亚历山大·库博（Alexander Koop）表示，研究结果显示当前援助志愿者们没有感到力不从心；很多自发的倡议团体变得更加牢固，有的还成立了协会，形成了有承受能力的构架。这表明人们已经适应了当前状况，并找到了应对的道路。

贝塔斯曼基金会称，科隆除夕夜的性侵事件没有对救助难民的行动产生负面影响。库博说，对之前就积极援助难民的人的访谈显示，他们之后也会继续投身这一事业；这些人认识了难民群体，了解了他们的需求，也知道了自己援助的能力，他们能够分辨是非。

德国红十字会秘书处的迪特尔·许茨（Dieter Schütz）说：“这一局面即使是在维尔茨堡和安斯巴赫发生恐怖袭击之后仍不会改变，对此我们持乐观态度。我们呼吁所有的援助志愿者，不要因为个别人的恐怖袭击行为就丧失信心，对难民的援助行动还要继续开展。”很多援助志愿者的确认为“我们做得到”。

对政策的要求

尽管如此，援助组织对政策有很多改善建议：避难程序须继续加快，这样难民才知道自己处于何种境地，能够准备好适应新情况。因为避难程序时间过长、无事可干，很多难民居住点的难民觉得很沮丧。

一些马耳他难民希望德国在难民安置方面出台统一的质量规定。难民援助专务组的马尔库斯·本斯曼（Markus Bensmann）表示，无监护人的未成年难民从一开始就必须得到妥善照顾。此外一些难民救助项目也缺乏中期财政支持。

看着援助志愿者们希腊晚餐和韦瑟灵的难民们，尤莉亚·吕克觉得这点辛苦也算不上什么：“除了我们还有谁能做得到呢。”

热点透析

罩袍禁令之争：意识形态的面纱

《明镜在线》8月16日评论 基民盟竞选者要求在德国实行罩袍禁令。但德国不能仅靠衣着规定打赢同伊斯兰教徒的战争。

一个幽灵在德国的土地上游荡，此前几乎没有人见过它：它穿着黑色长袍，只露出两只眼睛。今年夏天正是身穿罩袍的女性引发了一场政治讨论，基民盟的州内政部长强烈支持在德国禁止罩袍包裹全身。

在柏林以及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州议院竞选已如火如荼地展开。基民盟在这两个州的民调情况并不乐观，德国选择党紧追其后。因此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的内政部长、基民盟头号候选人劳伦茨·卡菲尔将废除双重国籍和罩袍禁令作为竞选主题。

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州有多少女性只能戴着面纱出门，没有可靠的数据说明。但可以明确的是：当警察感觉无力保护难民居所免受当地人的暴行，那么该州的内政部长就面临着更为紧迫的问题。在难民营闹事或者威胁难民的“忧心公民”和穿罩袍的女性都与开放、民主的社会理想不相符。极端右翼分子通过特殊着装公开表示对德国的排斥，尽管如此，没有任何一个内政部长要求去除他们的特殊着装。

这不无道理，因为这两种情况的根本性问题都一样：重要的不是人们身上穿了什么，重要的是罩袍存在于人们头脑之中。德国不能通过衣着规定取得与伊斯兰教意识形态和拒绝融入者斗争的胜利。柏林基民盟公安局长弗兰克·亨克尔表示，人们可以通过法律废除这种“布料笼子”，但意识形态的枷锁依然存在，它甚至可能更加难以冲破。

基民盟的政客们认为，妇女是在丈夫的强制下穿上罩袍或戴上面纱。可禁令出现的后果可能是，女性甚至不被允许出门，也不能参与公共生活。那么支持禁令的人将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基民盟和基社盟党人对平等和个人自由等价值的吸引力并不信任，以至于他们认为必须借助禁令来体现这些价值。

德国如果实行罩袍禁令，那么就与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在同一层次。在这两个国家，执政者擅自决定妇女在公众场合怎样着装——当然是佩戴头巾。德国不应做同样的事，这与自由民主的理念不符。

德国民众对待难民：恐惧与援助并存

《南德意志报》网络版8月23日分析 德国难民危机引发了数十年以来规模最大的公民社会运动。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禁会问：是哪些人提供了援手？他们的驱动力是什么？他们的底线又是什么？

目前德国选择党的成员人数已达到约24000人，排外的“欧洲爱国者抵制西方伊斯兰化”（Pegida）团体的黄金时期也差不多鼓动了这么多人走上街头进行抗议活动。但是这24000人与900万人相比又意味着什么呢？德国新教教会社科研究所的一项调查表明，截止到2015年底有10.9%的德国人，约900万人参与了救助难民的工作，比德国人一向最热衷的活动——体育所参与的人数还多。与许多预言不同，德国的“欢迎文化”尚未终止。据贝塔斯曼基金会的一项研究，很多倡议团体以及自发形成的援助组织在此期间甚至变得非常专业。

面对德国选择党大选节节胜利的局势，那些选择党选民的恐惧感总是引发德国公众的关注，而与之相反的人们获得的关注较少，他们表现出的面貌是：勇气、投入、好奇和理想主义。德国社会心理学家、偏见问题研究者贝亚特·库珀（Beate Küpper）表示，在很特殊的情况下，比如面对数十万移民大量涌入的时候，人们总会表现出两个基本倾向，这一点我们从婴儿身上就可以看到：在好奇心和胁迫感之间摇摆。

安全感

哪种人会感到恐惧，什么样的人又会表现出好奇心呢？库珀表示，值得注意的是，

看护人怀抱中的婴儿更常做好奇的举动，而不是防御和恐惧。研究人员从援助者身上得到的印象与此相吻合。通过柏林科学中心和慕尼黑实用科学学院问卷调查得知，大部分难民援助者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较稳定，其中很多人都有着体面的工作和不菲的收入。

当然也有很多虽然工作体面但是抵触难民的人。库珀表示，保守的观念和对身处环境的不安全感使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前什么都比现在好，或者干脆认为，一切都必须保持原样。事实上，以前对白人男性一家之主可能确实什么都好，但对于其他群体却完全不是。

援助者的受教育水平超出平均值

与此相对，也有很多工资微薄的人愿意为难民付出一己之力，在这一方面占援助者群体比例较高的大学生们就是很好的例子。这是一个通常收入很少的公民群体，也不一定都有很好的工作前景。但从另一方面看，他们很符合援助者的特点。因为援助难民的志愿者群体的教育水平超出公民整体平均值。库珀表示，民调中教育水平高的人比教育水平低的人持有更少的偏见；这里的教育水平不一定表示数学成绩要很好，而是指有时间、有智力水平参与社会进程和民主实践的讨论。并且，对其他文化的知识的掌握也有积极作用。

问卷调查还显示，很多援助者的动机不仅仅是利他主义。尽管对于很多援助者来说人道主义和宗教（“行善事”，“担道义”）是很重要的动因，但很多援助者也明确表示有个人原因，比如“传递我的知识”“被需要的感觉让我很满足”或者认识来自其他文化的人很有趣。对他们来说，帮助难民也是安排休闲时间的一种方式。

援助者经常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侮辱和威胁。所以库珀会向一些自己没有实施援助行动，但认同援助是好事的人提供咨询，告诉他们如何友善对待援助者。

促进积极投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人是否有共情能力。“我们总是碰到一些年长的人，他们在难民危机中会想起自己以前的逃难经历，所以愿意帮助难民。”也有一些年轻人，他们自身有移民背景，所以也非常积极地伸出援手。这并不意味着，援助者没有不安全感。研究者发现，很多援助人员刚开始对自家附近的难民营也心存疑虑，但之后决定积极援助，这样可以让所有人的情况尽可能变好。这种心态和援助者的自我认知有关。很多人说，我不想成为自闭和胆小的人，而想变得开放和慷慨。

援助者很幼稚？

这个观点在讨论中引发了一些批评。有人认为援助者很幼稚，没有看到真正的问题。在科隆除夕夜性侵事件和几起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袭击事件发生后出现了这样的指责声。库珀不这么认为。“恰恰相反，很多援助者在援助工作中体会到了让难民融入有多么困难。”援助者经常遇到官僚手续阻力或者发生个人冲突。他们不可能一直幼稚下去。

如果一直坚持不懈地追求开放和慷慨会怎样呢？哲学家和环境伦理学者康拉德·奥特（Konrad Ott）在其杂文集《移民和道德》中探讨了这个问题。他对“欢迎文化”持怀疑态度。奥特的文章特别值得一读，因为他绝不是 Pegida、德国选择党等极右组织的追随者。相反，如果让德累斯顿排外游行的人描述什么是“好人”的话，奥特很符合他们的描述。他是绿党成员，他的夫人是神学家，正如他在一次访谈中说的那样，他身处的环境中只有一种意见：德国必须在难民危机中展示友好和开放的面貌。“我了解这种道德，因为它也是我自身的一部分。”

“欢迎文化”的边界

奥特对那些给难民上语言课、为难民提供人道援助的人表示最高敬意。“但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必须得寻求一条政治途径来解决作为国家如何处理难民情况这个问题。”这样，欢迎文化立刻就碰到它的边界。

奥特在其杂文集中根据马克斯·韦伯的理论将难民危机的主体分成道德型伦理者和责任型伦理者。前者是奥特所称的身处环境中的人，如绿党政客，还有部分左翼党人和自由媒体。他们倾向的观点是：“所有难民有寻求保护的道德权利。”后者指的是自由-保守媒体、法庭和行政机关，还有社民党和基民盟中的一部分人，他们更关注难民运动带来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因此寻求国家可以承受的解决方案。两个阵营的分歧之一是：什么应该视为逃难的充足理由？道德型伦理者倾向将已被认可的逃难理由战争和迫害扩展到贫穷、男女不公正待遇和环境灾难。奥特认为这些虽然值得同情，但是从责任型伦理者角度看却存在问题。双方讨论的起点是道德立场，道德立场看起来不容置疑，实际却将争论导向了“开放的边界”，即人在全世界都有能定居下来的权利。这个权利让难民接收国的组织能力不堪重负。

徘徊在开放边界和欧洲堡垒之间的德国

根据比勒菲尔德大学的一项问卷调查显示，很多德国人同意奥特的观点：欢迎文化在过去几个月获得的赞扬度在减少。尽管有四分之三的德国人认为难民有权利享有更好的未来，但是60%的人担心他们来到德国后会带来问题。有关世界范围的伊斯兰恐怖袭击、性侵和融入问题的报道增强了人们对难民的不信任感。奥特认为，责任伦理者坚持严格区分逃难和移民这两个概念，认为国家接收能力有限度。这类人可能有转向冷漠的危险，可能将欧洲变成一座堡垒。“这样很快就可能出现这样的言论：当然也可以向儿童开枪。”根本上说，两个阵营的矛盾还集中在另一个问题上：哪种权利更高？是个体要求受到人道主义的、道德上毫无争议的对待的权利，还是国家为自我保护制定规则的权利，其中包括限制本国以外公民的个体权利？奥特在其文集中准确地描绘了德国人过去一年在难民讨论中的摇摆态度：“欢迎文化带来的欣快感让步于一种新的冷静”，“我们现在更多的是讨论政治问题，比如与土耳其的协议，而不是讨论道德问题”。同时，溺亡难民的图景还一直在人们脑海里，在道德上让人难以忍受。贝塔斯曼基金会的调查显示，这样的图景正是让德国人总保持着救援意愿的重要原因。奥特则在文中描述了很多德国人的道德困境：欧洲不应该成为堡垒，而应该承担责任；但是也不能就这样撤销所有边界。这是会一直困扰德国人的两难困境。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10日、25日出版

2016年9月10日 本期为合刊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朱苗苗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